苏南乡村社会转型的挑战及反思

郑芸 吴晨潮

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所指，或是作为“落后呢、即将被淘汰”的代名词，或是指蕴含温情的恬淡理想生活，或是指扭扭被遗忘的空间……由此可获甸。现代化犹如一场巨大的潮汐，裹挟在其中的乡村必然发生变化，亦可能会有不同的命运。作为特定地域空间的苏南，其乡村有着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经历了乡镇企业的辉煌又成功地转型至民营经济、园区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苏南的特殊意蕴决定了其乡村社会转型必然具有逐方特色。

一、苏南乡村社会转型的原点及基本形态

20 世纪中叶之前的苏南乡村，河网纵横的地理形态直接决定了一沿河而居”的村庄聚落形态，很多村名中含有“洪、港、溪、湖、泽、灯、河…”等字眼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往往村庄规模偏小；因土地肥沃和灌溉方便而物产丰裕，“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促使国家力量对此地乡村加强了控制力度，诸如宗族、会社等社会力量的生成有限；因灌溉方便以及生态的多样性，凭一己（家庭）的力量往往就能解决生产问题及天灾人祸时的生存问题，村民之间的合作需求并不强烈，原子化趋势明显，村庄内部的规范和秩序的约束能力有限。

尽管如此，传统时期的苏南乡村相比较于城市，其均质化程度更高，结构上由于内部的均衡态呈现出内卷的封闭状态。苏南乡村社会结构转型，在客观上可以通过村庄内的关系、村庄功能和村庄形态等多重维度来观察和描述。经济关系的变化是村庄转型的基本动因，在此基础上村庄的功能和空间形态也发生相应变化，因为“由社会所生产的空间，就是各具有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得到再生产之所在”。

在现代化进程中，卷入乡村经济关系的往往有三种力量：资本、农民和国家（政府）。资本进入乡村，试图将一切资源商品化最终将乡村引向市场化，由政府主导而开始的乡村工业化，农民对市场化、工业化既拥抱又拒斥的矛盾态度，三者共同作用于传统乡村结构并促使其发生变化。

苏南乡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在 1949 年之后遭遇到了强烈的解构运动，如果可以理解为外部力量所致，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结构的变化，则应是内外力量共谋所致。村庄内部需求的多样化与能力差异性在政府对农村经济管制的放松后出现了强烈的离心运动，资本也在政府退却之后进入村庄，内外结合，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虽在磷黔不尽相同，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型已是不可避免。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苏南乡村社会结构由经济结构始，历经了分散型的乡村工业化阶段，自上世纪 90 年代由乡镇企业改制从而出现“去农村社区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在政府主导下的外资企业集聚的“园区经济”向农村土地迅猛扩张。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对乡村形态的外力改造影响也是特别巨大，于是乡村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文化特质以及空间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或是几乎无法寻找原来踪迹的激变，或是静默无声的流变。

乡村的空间形态变化的最突出特征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被压缩，其压力来自于更高的居住要求、工业生产及交通和人口集聚，其空间性则由自然空间逐渐向资本主宰、政府主导的社会空间转变，空间特征则由分散的星点状走向分类集中的斑状图景。乡村的空间被压缩之后，苏南乡村的命运大体有如下几类：一是在工业化直接推动之下直接演化成城镇；二是在城镇化的进程沦为城中村并最终被城镇化完全吞没；三是在园区经济模式下为工业发展腾出土地，往往多个村甚至一个乡镇整体拆迁组合成新的农民社区；四是因乡村工业的衰败和交通不便等因素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村庄，在近年来政府主导的新

农村建设中大都并作为以城镇居住形态的农民公寓或新农民社区之中；五是因乡村特殊的文化价值或是历史价值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如苏州太湖中的半岛东山镇和小岛金庭镇（原名为西山镇），在改革开放早期受制于交通条件乡村工业基本无法展开，经历了最初的经济困难之后却也因祸得福，生态环境保护完好，保持着原貌的古村落建筑、村落格局成为之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的独特资源

二、苏南乡村社会转型面临的挑战

首先，原有的乡村伦理观面临着解体和重构。宗族、血缘是乡村伦理观构建的主要维度，虽然苏南地区的宗族组织发育有限，但由血缘连接的亲族关系在原有乡村环境中，是个体身份定位的重要影响，也是个体行为选择的重要价值参照。

但随着人口的外迁、外来人口的进入以人整体性搬迁中自由选择而形成的分散居住，血缘关系对个体的联结和约束功能迅速淡化，原来在乡村大量存在的大家庭模式基本消失，随后就出现子女因空间距离或是工作缘故，往往忽视了对家中老人的照料和精神关照，老年人的失落甚至是怨恨易引起家庭矛盾，重新构建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不但存在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中心主义的障碍，也出现了由于空间形态变化之后的客观障碍。

另一方面，乡村的独生子女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婚育阶段，由于居住、工作大都在城镇或是靠近城镇，观念方面的相应变化自是难免，这样的变化也表现在如何确定下一代的姓氏中，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无论男方家庭还是女方家庭都有血缘延续的强烈需要，与传统的“孩子随父亲姓”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于是出现了因下一代姓氏问题出现了婚恋搁浅、双方家庭反目，甚至是当事人夫妻双方会因捍卫自己家庭的意愿或是“面子”愤而离婚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个体、家庭在社区共同体的消解和重建过程，确有被形构的部分，但绝不可能是全部亦不可能是同步，类似家庭伦理观的重构滞后于社会（社区）转型、构建的步伐时，行为失范和社会序的风险明显在增大。

其次，新型“农民社区”出现了自我认同困难。第一，承载村庄历史、联结村民情感、标志村民身份的原来物质形态的村庄及风物已经不复存在，村庄的消失“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某些社区生成的意义自修到疆界以外，而同时又剥夺了继续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领土的意义和赋予同一性的能力”，自我认同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第二，新型“农民社区”的“两型社会”的特征导致了农民向城市融入中的心理障碍和现实困难。依据理性原则构建的充满变化的现代性和依据经验构建的内卷化的乡土性同时并存于新型“农民社区”，这种“两型社会”下农民社会行动的意义来源更加多样，行动的合理性可以在不同的意义框架下得到恰当の説明。但问题是，当着不同意义框架都具有合理性时，一个共同的集体意识还何以可能？一个完整的社区还能否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有效载体？

换言之，农民在获得了社会行动的自我认知后，还能否建立起有效的社区认知？农民一方面会在传统性寻找自己的情感寄托，不断在心理上重复并享受着“我曾经是谁”，另一方面对生存压力更大的现代性氛围中的“我现在是谁”往往拒绝承认。当然这种认同心理的构成不仅来自于主观，还来自客观条件，据相关调查发现：综合来看影响农民融入新生活环境的各种因素，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分别是政策公平度、收入合理度、教育程度，年龄。现实中依然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地表现优质公共资源的分布不均匀，比如说医疗卫生资源往往在农民社区周边量少且质量不理想，教育资源依照社区划定的学区目前还未能做到原有城区与农民社区均等化的发展水平，即便在硬件设施上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在师资等方面的差异仅依靠少量教师的流动恐难根本上弥合差距，这些差距往往会提高农民融入城市的成本，或是加重了融入城市的受挫感，对所在社区的自我认同便难以形成。

最后，转型时期苏南乡村的空间变化考量着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资本和政府改造乡村空间时对农民主体性的忽视，是否暗含了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农民生活、生产空间的改造，农民居然“不在场”。资本断味不会顾忌农业的弱质和农民的弱势，按其习性只是要利用农业的弱贡和农民的弱势去获取资本

的最大利益：“傲慢”的政府权力借助与知识的结合，用真理的外衣粉饰其对乡村改造的官僚实质，从而压制了农民对乡村发展的话语权，这不仅有可能违背农民的意愿，而且有可能将各具特色的乡村文化毁于重规模、好统一的政府喜好中。“三农”的短期利益、长期利益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都存在受损的高风险。

第二，政府和资本对农民低成本生活方式的改造和剥夺，加大了农民的生存风险。土地本是农民解决生存问题和抵抗经济风险的重要保障，从经济投入和社会风险方面来看对农民都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资本期许的短期利益和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农民往往会放弃对土地的使用权，这种“激进的乡村现代性模式消解乡村社区集体原本式微的庇护作用，也没能让农民对生活前景更有信心，没有为乡村社区提供持续发展的可能，生存前景的不确定给乡村拔根的农民带来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12]，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能力本就不强的农民群体的生存风险陡然增大。让人不得不疑问：新农村建设的究竟是促进农村繁荣还是保障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用地需求？

第三，“土地换保障”的乡村改造思路依然体现了农民的不公平待遇。“土地换保障”对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中低位的农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是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向乡村空间扩张屡屡奏效的关键。苏南地区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搬迁农民享有较高社会保障水平，为这一模式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诠释，成为全国其他地区学习和羡慕的对象。

在光鲜的表象背后，农民权利未能被公正对待的事实依然存在：给农民社会保障，并赋予平等的国民待遇是责任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以农民的权利换取国家本应承担的义务的做法有欠公正。农民在乡村空间改造过程与政府、资本博弈的弱势，不仅损害了“三农”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乡村社会生态的紧张，较易成为乡村群体性事件的源头。

三、苏南乡村转型的反思

首先，政府的立场和作为至关重要。当下苏南乡村正处于十字路口，依赖惯性继续向前滑可能行之不远；向左转，前景是确立城乡衔接，形成村落共同体与城市的联合体；向右转，则是听任市场力量分解村落共同体，一股脑驱使农民变成城市的劳动力商品。向左抑或向右，应是政府的立场所致。事实上，一切外部力量对乡村的介入和改造，必须以乡村为本位，尊重乡村（共同体）发展的客观规律及乡村的文化和情感。

政府引导的新农村建设，以积极的政府干预对抗资本对“三农”利益的侵蚀，其立场完全正确，因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难摆脱对“城市中心主义”的依恋而招致批评。

政府应该降低对农村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索取意愿和利用企图，更多地以负责的姿态给农村社区提供充分有效的基础设施、服务，以及道路、运输、通讯条件和其他公共物品，解决现有城乡联合体中乡村屏弱的状况，塑造平衡态的城乡联合体，从而也弥合城市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思路。其次，农民应当借助多种维度形成组织化的生存方式。不管政府如何负责、正义，缺失了农民而构建起来的新型农村社区，其合理性终是有限。

一直以来，农民缺席于乡村重新构建的总体规划中，既缘于内卷化方式下生活已久的惰性，同时长期的原子化生存方式致使苏南乡村农民缺乏与政府、资本的谈判能力而被忽略。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才有足够的力量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如何组织？

目前苏南农村由政府倡导建立的专业合作组织，对农民具有经济上的合作和保护功能，共同生产和利益共享已将农民组织起来，随着苏南各地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此类组织出于自身发展需求发展壮大之后形成了更具组织形态的行业协会，将是未来农民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另外，借助网络和健身运动等纽带农民开始了自发组织的生活，既体现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又体现了互益和公益宗旨解决了集体行动的困难，尽管这些纽带的联结作用比之传统的血缘、家族关系远为松散，但若能在多个组织化的生活方式中形成交集，反复认知强调这种互相间的组织关联，农民自发联合的可能性和力度都将大大增强。

（作者单位：郑芸，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吴晨潮，苏州市党史办公室）